

大师已逝，而他们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李嘉言与恩师闻一多

李之禹

李嘉言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在楚辞、唐诗、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他首倡的改编《全唐诗》动议影响深远。但他一生研究的门路和方法，深得其恩师闻一多治学三昧。闻一多对李嘉言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品质影响至深。

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李嘉言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说：“就我个人说，和闻先生已有15年的师生关系，同他在一个环境内生活，也将近十年。”是指的他与闻一多的接触和受言传身教而说的。若从一个学者从大师受教的几个阶段：素学、清修、升堂、入室看，1941

年9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主任闻一多圈定李嘉言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召至自己麾下专门从事唐诗研究后，李嘉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受到闻一多的公开称赞。此后李嘉言在《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学、唐诗以及古文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李嘉言称得上是闻一多的“入室”弟子。

清华求学（素学·清修）

1932年8月底闻一多初回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时，李嘉言已是国文系三年级学生，选

修闻一多诗经、楚辞、唐诗课。闻一多在回到清华的最初几年潜下心来苦读苦研。

李嘉言来自河南农村，性格沉静而讷于言谈。他秉赋并不特别聪慧，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没有很好的经济来源。他只能靠苦学苦读来安身立命。这一点与闻一多有相似之处。真正做学问的人大抵如此。李嘉言受教于闻一多后的两年中，在三、四年级共发表论文十篇，其中《诗经》一篇、《楚辞》一篇、“唐诗”三篇，正是在闻一多指导下完成的。李嘉言说过：“我在清华大学相当努力地学习业务，跟着陈寅恪、闻一多老师学‘考证’。”

做闻一多助教时，他研究唐诗的路子也是按照闻一多研究唐诗的路子进行的。他从研究贾岛入手而研究中晚唐许多诗人，这一想法得到师友，“特别是闻一多先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闻先生又屡次给我提供意见。《闻一多全集》中的《贾岛》一文，就是在他阅过我最后一遍稿后写成的。今当《贾岛年谱》再版，我不能不补充说明这一经过，借以纪念闻先生”。

1937年9月底，李嘉言在河南农村接到清华大学电报，



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步行赴昆明出发前，“步行旅行团”辅导教师合影。右起：毛应斗 吴征镒 曾昭抡 袁复礼 闻一多（蹲者）黄钰生 许维遹 李继侗 郭海峰 李嘉言

克服许多困难借了钱从郑州再由汉口转抵长沙，义无反顾地赴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做助教。从中可以见到李嘉言追求真学问的“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语）持之以恒的真精神和他的责任心。这方面他与他的恩师闻一多有很多相似之处。

李嘉言能受教于闻一多，是李嘉言学术生涯中的大幸！正如李嘉言1934年清华毕业前写的文章里说的：“孔坛马帐，既闻道以进修；扬处朱门，时载酒而立雪”、“好学耽思，持坟入典”。

在西南联大（升堂·入室）

1938年初，临时大学奉令迁往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很困难的师生270多人组成步行旅行团，绕道湘西经黔滇抵昆明。步行的教师共11人，三校文学学院的教师只有清华国文系闻一多、许维遹、李嘉言三人。

一路上，27岁的李嘉言负有照料导师闻一多的责任。这就是李嘉言在文章中所说，他与闻一多“在抗战头五年内，有两个时期几乎是形影不离，读书、吃饭，甚至走路都在一起。没有他这五年口头地精神地督促，我未必能这样勤奋地读书”。

1939年9月起闻一多国内研究休假一年。闻一多离昆明前，李嘉言将《贾岛年谱》第三遍改定稿交闻一多匡审。9月一个月内，李嘉言两次去信给



1938年4月29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的次日，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辅导团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陆军中将、步行团团长）、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中排左起：李嘉言、毛鸿（教官）、卓超（教官）、许维遹、闻一多、□□□（总务负责人）、□□□（医生），后排左起：吴征镒、徐行敏（医生）、邹镇华（教官）、杨石先、袁复礼、沈履、曾昭抡、郭海峰（护士）、□□□（医生）、毛应斗

闻一多，汇报了自己研究《离骚》、完成“杂论《离骚》”一文的情况。10月9日，闻一多回信：

嘉言吾弟 两函并悉 来晋后穷一月之力将《离骚》旧稿录成清本 尊著贾谱未及披读故前函未即奉复尚乞谅之 今悉足下亦已撰成杂论离骚一文 兴之所至不约而同亦云巧矣 尊稿缮清后即邮下俾得先睹为快……

1940年3月14日，李嘉言第三次给闻一多去信，呈上自己新的研究论文《诗经“彤管”为红兰说》。3月底闻一多给李嘉言回信，首先肯定李嘉言“云兰草泽兰可通称”的观点，称“此点甚重要”。认为兰茅亦可通称。抄录其《离骚正义》手稿大段，引证“管管同声，管茅同名，彤琼同色”，亦证“彤管”为“红茅”。二位先生研究之契合，又为一例。

1940年春夏，闻一多腾出

手来认真匡审了李嘉言的《贾岛年谱》第三遍稿，8月底闻一多搬回昆明交给了李嘉言。李嘉言根据闻一多意见，对《贾谱》再作修改，誊清第四遍稿，闻一多审阅订正后，交《清华学报》，发表于十三卷二期（1941年10月）。《贾岛年谱》篇末，李嘉言“附识：此文承闻先生一多订正多处，谨此致谢”云。1941年9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刚成立，已就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的闻一多将李嘉言圈定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

昆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

其实在此三、四个月前，闻一多已为李嘉言入所专事唐诗研究做准备了。他是想尽己之力留住人才。由于生活实在困难，多年升迁无望，家累又重，李嘉言已有另谋出路的意

思。李嘉言拜托罗常培先生作伐，介绍给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黎锦熙，到西北师院教学。罗常培答应了此事。

闻一多爱惜人才，为了留住人才，在极不愿意做了国文系主任不久的1941年6月5日上书梅贻琦校长，请求将李嘉言由助教改聘为教员：

查中国文学系助教李嘉言先生，来校服务六载于今，黽勉在公，辛劳弥著，允宜优礼，用酬贤劳。拟请自民国三十年度起改聘李君任中国文学系教员，是否可行，尚乞鉴裁。

1941年8月，李嘉言被改聘为教员，月工资170元，但还是解决不了肚子问题，更遑论养活家小。（170元仅相当战前5.4元，此时月膳资300多元。见《浦江清日记》1942.11.23）

8月底、9月初，西北师院方面毫无音讯。李嘉言联系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职务，薪水较高，又可继续做研究工作。李嘉言有所心动，但于心又不甘，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闻一多，当即遭到闻一多的斥责和慰勉。李嘉言听从了恩师的劝诫，留在文科所跟随闻一多做唐诗研究。虽然生活仍是那样清苦，好在他是与其他教师、助教及研究生们（许维遹、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等）在楼下吃集体伙，虽然天天是盐水茼蒿、萝卜、糙米饭，但尚可果腹。这一群穷书生们就是在这样国难当头的窘境中，在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山沟里，

延续着民族的文脉；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民族文化的沉重希望；燃烧着自己身内的膏脂，赓扬着民族精神的薪火！

闻一多此时也处在困顿中。教授的薪水虽高，他也难支半月家用。他典当过狐皮大衣，还将珍贵的线装书卖给清华图书馆。但他怜才之情，处处可见。这位“不下楼主人”经常在吃饭的时间叫李嘉言上楼边吃边讨论楚辞、唐诗问题（笔者幼时多次耳闻此情景）。毕竟在研究所，只有他们二人研究内容相一致。闻一多为了留住他培养多年的学生，生活上关心、精神上影响、学术研究上倾心扶掖……可谓用心良苦。1941年9月10日，闻一多又为李嘉言加薪事再次上书梅贻琦校长：

月涵校长先生道席：敬启者，李嘉言君在校任教六年，备极辛劳，年来于课余从事研究亦颇著成绩，本年已改聘为教员，惟其数额仅依定章递增至一百七十元，查李君家累颇重，际兹物价高涨势难维持，拟请将其数额酌予提高以励贤劳。

不久梅贻琦破格给予李嘉言月薪190元的酬劳。梅贻琦对李嘉言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了解的，愿以襄助。闻一多在三个月内，为李嘉言的晋级和加薪两次上书梅贻琦，这在闻一多一生行事和其性格中是罕见的。原因只有一个：惜才！爱才！励才！其心可鉴。而李嘉言用一生的成就和同样的心，报答他的恩师。

在文科所，闻一多是最刻苦的。“他读书读得那么起劲，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书房里。譬如在昆明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时候，一同研究的先生们有六七位，论写读时间之长，谁也赶不上闻先生。他也有那份精力，每天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有时不洗脸就坐到他那书桌前面了。在夜间也常常是他熄灯最迟。就在这样比较之下，我们几个人也不知不觉的多做了许多事。这也是一种习惯，有了这种习惯，‘一日不读书，就觉得不舒服’。‘有时无病也觉得不舒服，原来是今天还没有念书’。闻先生说过的这些话，我现在居然也有时领略到了。”李嘉言在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回忆说。

闻一多以自己的行动，带领着他的学生们；以他的精神，感召着他的学生们；研究上，坦诚地指导着他的学生们。何善周曾回忆说：“李慎予（李嘉言字慎予——笔者注）当时在清华已经八、九年了，闻先生还是经常关心着他的研究工作，给他介绍参考资料，对某一个研究项目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慎予正在研究唐诗，闻先生把自己当年研究的心得都提供给他。他曾说：‘这些东西当年我没功夫写出来了，你们用得着就使用吧！’”

闻一多的《岑参年谱》手稿，内含更多的资料。李嘉言就是在这里受赐阅，作参考，写成了自己的《岑诗系年》。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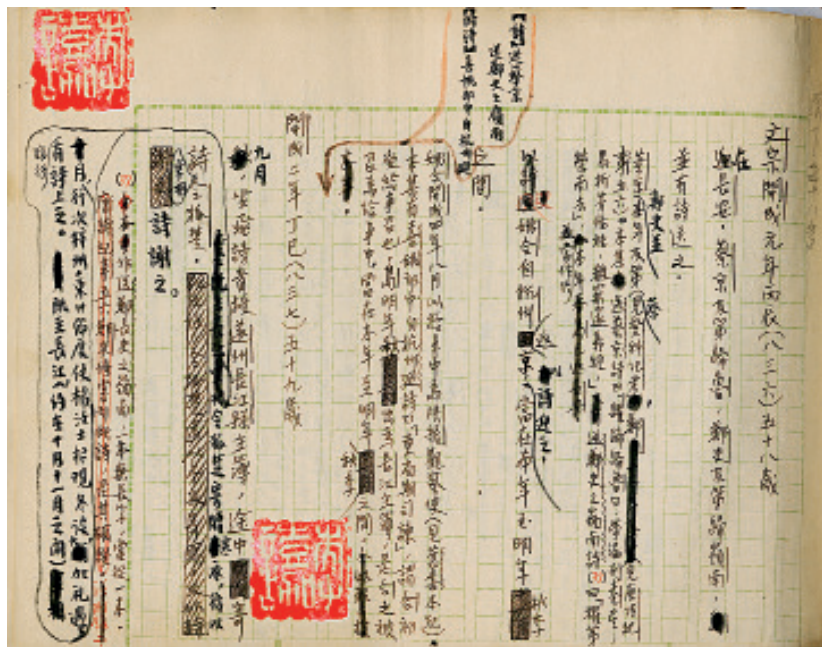
前后都有《全唐诗校读法》的文章，李嘉言的《全唐诗校读法绪余》正是在这时期定稿，并经闻一多审阅。

在闻一多指导下，文科所的一年中，李嘉言发表论文五篇，完成《岑诗系年》、《金碧文论》（收论文23篇）、《孟浩然年谱略稿》、《武陟方言考》、《编年 长江集》等专题研究8部（篇）。李嘉言还起草了《改编全唐诗刍议》（“只作一小部分”——李嘉言在文科所笔记上原话）。刚入文科所的1941年9月22日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深受闻一多赞赏：“李嘉言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2、13期上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的论文是整个司家营的光荣！”季镇淮先生也回忆说：“闻先生说：《唐诗分期与李贺》不仅是慎予的光荣，也是整个司家营（文科研究所）的光荣！《唐诗分期与李贺》对唐诗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有了新推进。”

1942年7月4日，黎锦熙给罗常培发来电报，西北师范学院破格聘定李嘉言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旅费同时寄出。闻一多得知事情无法更改，甚为痛惜，李嘉言也颇费踌躇。他舍不得离开文科所和闻一多，舍不得丢下已开展的多项唐诗研究！

惜别·永诀·融合

1942年7月12日晚，闻一多指示在文科所“主楼下边办



闻一多批改的李嘉言“贾岛年谱”手稿之一。朱笔墨笔俱为闻一手迹

了一顿饭，欢送李公”。“李公走，大家都感到可惜，闻先生也不希望他走。闻先生不高兴，说：‘走了可惜了！’李公离开昆明学术上有损失，我们几个助教、半助教、研究生议论说李公走了不合算，失去了学术研究渊流。”季镇淮回忆说。范宁也回忆说：“在欢送会上，闻先生不无痛心地说：‘我是不同意他走的，可生活太苦，非走不可！’”何善周《千古英烈 万世师表》记载：“一九四二年秋天，李嘉言离开了清华，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了。对于他的离开，闻先生是很痛惜的。”

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李嘉言是在兰州报纸上看到的。他无比愤恨和痛苦！在文章里他写道：“三十一年我自西南来到西北，从此也就离开了闻先

生，没想到那次离别竟成了永诀！闻先生死了，对于国家，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该怎么估计！……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对于我是无法补偿的！”

李嘉言是闻一多回清华后到去世前精心培养的学生中，学业最刻苦，研究能力强，研究门路最贴近，性情最相似，相随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卓著的一个。闻一多和李嘉言在学术的星空中都过早地殒落了！思之令人凄然！

斯人长逝，他们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作者为李嘉言之子，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语言文学副教授）